歌词创作系列谈

歌词理当忌“六气”

□杨启舫

“六气”之说，源自清代邹一桂《小山画谱》里的“画忌六气”。“一曰俗气，二曰匠气，三曰火气，四曰草气，五曰闺阁气，六曰蹴黑气。”如果拿这些看似经年久远的“画品”来与我们今天歌词创作对号入座的话，则不免有些芒刺在背的感觉。古人说：诗书画同源。这意味着书画里的那些美好曼妙在歌诗里都能有所体会，而换个角度看，书画中那些常有的毛病也会在歌诗中找到投射的影子。

不幸的是，如今古人所言书画“六气”的社会面传播尚没有“清零”，而歌词创作中的“六气”却愈演愈烈。曾几何时，“小三也有情，小三也有爱”“你做了我的小三又当了他的小四”这样恶俗的歌词竟然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了。一口气连唱14个“伤不起”“你说嘴巴嘟嘟，我嘟嘟嘟嘟嘟”这类没有营养的口水歌也开始病毒式地“流行”了。而一些低俗无脑甚至是色情恶俗的歌曲居然成为孩子们传唱的“儿歌”。加之某些感情虚假、急功近利、绝少文雅的匠气之作，某些打着国潮旗号糟蹋经典、胡拆乱搭、不知所云的伪古风之作，某些通篇毫无骨力、媚气娘炮、矫揉造作的胭脂气之作，某些无病呻吟、不知所云、空洞乏味的空泛之作等等渐有漫延之势。

我们不仅要问，当下的这些歌词是怎么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意蕴、典雅、灵动、形体与风骨之美怎么开始缺失了？与西方的拼音文字不同，我们先人创造了音、形、意三维立体的中华汉字，这种既能表情、又可达意的文字为歌词创作提供了无限可能。数以万计的汉字组合为我们生活的天地万物、草木鸣虫乃至岁朝月令都提供了多种表达方式和别致的雅称。譬如我们从古写到今的那一轮明月，就有“玉兔、素娥、望舒、玉蟾、桂魄、婵娟、嫦娥”等几十种别名供选择，而这些不同的雅称可以准确传递中国人在不同环境和心境下情感的细微变化。有了这么好的中华文化加持，难怪李白一个人就写了300多首关于月亮的诗词。因为这博大精深的中华汉字本身就如茫茫夜空里那一轮时而淡雅、时而皎洁的月轮，蕴藏了无尽的灵感。

中国古代把歌词叫歌诗，绝大多数的诗歌都是可以想唱就唱的。中华汉字里的四声特别富于音乐性。正如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音律》中所言，“句之长短，字之多寡，声之平、上、去、入，韵之清浊阴阳，皆有一定不移之格。”这样前有浮声、后有切向的“声音之道”让歌诗有曲即歌，离曲可吟，因而才具有更旺盛、顽强的生命力。

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的一些音乐人已经渐渐失去了对传统文化坚守的耐心。以流量为王、把营利看作目标的商业化生产运作模式，让写词变成了工业生产流水线上的一个工种和环节。歌曲投入的多少、内容定向与推送力度等都更依赖于算法与大数据的“需求”。与歌词的内容扎实、用字考究、平仄讲求相比，部分词作者宁愿花心思找到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标题党”式的歌名，或者更依赖于炒作热点话题及爆红的网络流行语。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以及新媒体传播方式的特点也吸引部分音乐人只注重歌曲30秒内的魔性口号式循环呈现。乃至出现了一种对某首歌曲既不知道名字也不熟悉主歌内容，但一听到副歌部分却马上能够随口跟着唱出来的现象。

与古人相比，我们一部分词作者确实是表现得更懒于思考、热衷套路、急功近利了。同样是表达忠贞的爱，李商隐说“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们说“死了都要爱”；形容女性之美时，《诗经》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我们却唱“你的笑像恶犬”；感慨自然之险峻时，李白有《蜀道难》：“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我们则干脆就是“哇靠、666、绝绝子！”……汉字的美需要通过恰当地使用来展现，汉字的韵味需要通过大声吟唱来表达，汉字的博大精深是要通过写词人一代一代接续奋力、发扬光大的。说到底，歌词创作中表现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缺失也是审美能力缺失的一种表现，这必然会导致邹一桂所言的“俗气、匠气、火气、草气、闺阁气、蹴黑气”这“六气”的“盛行”。而相比于绘画而言，歌词所涉及的音乐创作是一项更具影响力和更具社会传播力的艺术形式，理应承担更多的社会义务和教化责任，因而在歌词创作中忌“六气”显得更加紧迫也更具现实意义。

中国是“诗的国度”，而中华民族汉字的“汉”本意就是星汉和银河。一个如此充满想象力的民族用天地化孕出的文字书写成词、吟唱成歌，这本身就是一件够诗意、够浪漫的事情，所以，作词人不应轻易放弃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而需努力找回华夏文明表情达意的文字之美。身为一个用汉字写作的人，那种根植于血脉中的“文化自信”是与生俱来的。珍惜它、用好它，亦是作词人的幸福。

（作者系词作家，中国音协理事，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会长）

艺 谭

左翼音乐运动对当代音乐文化建设的价值

□闫 铮

上世纪30年代民族危亡之际，我国文化艺术界众多爱国者纷纷发挥自身力量投身救亡图存、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左翼文化运动，建立了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拉开了左翼音乐运动的序幕。左翼音乐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以左翼音乐工作者为骨干并团结爱国民主音乐力量的无产阶级革命音乐活动。为了发挥音乐文化的精神和社会力量，左翼作家联盟积极弘扬苏联革命音乐和马克思主义音乐观，倡导广大音乐家紧密结合群众生活和社会革命现实，创作出为工农大众接受的新型音乐。在这一理论基础和时代背景下，左翼音乐运动中诞生了一大批具有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性质的，反映群众昂扬斗志和无产阶级革命诉求的进步音乐作品。这些作品时代性和政治性鲜明，同时兼具独特艺术文化价值，在团结群众和唤醒人民革命斗志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同时对我国音乐文化的当代建设也影响深远。

理论上强调音乐社会功能的发挥

左翼音乐文化运动改变了辛亥革命后“为艺术而艺术”的资产阶级唯心音乐观，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的具有大众化特征和现实主义价值的音乐观，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和社会现实的结合，为我国的当代音乐文化价值观奠定了理论思想基础。左翼音乐文化强调和彰显了音乐的社会功能，立足现实斗争的需要，用通俗易懂、反映群众生活和革命现实的歌曲作品发挥了音乐宣传革命精神、鼓舞人心、团结人民，唤醒群众革命斗争意志和强化人民爱国情怀的社会现实价值，比如《义勇军进行曲》《五月的鲜花》《打回老家去》等作品。这使得音乐文化在我国文化观念上不再只是远在楼阁之上的艺术雅致之物，而是能够促进群众精神觉醒和社会进步、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思想工具。在这一历史背景和理论指导下，当代音乐创作在方向和价值观上也愈发注重发挥音乐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团结群众、鼓舞人心的社会现实价值，创作出了《共圆中国梦》《中国人民有信仰》等新时代歌曲。

思想上确立当代音乐文化建设主基调

左翼音乐运动中所创作的音乐作品都承担着宣传教育和组织动员民众的重大时代使命，通过弘扬和传播积极向上的思想观念，解放和重塑人民群众思想，确立了我国当代音乐文化建设发展的思想主基调。一方面，左翼音乐的政治性和民族性确立了当代音乐文化在宣传政治思想和弘扬社会主旋律上的思想基调。左翼音乐以爱国主义和家国民族情怀为音乐创作的思想核心，旨在通过振奋人心震撼心灵的歌词曲调揭露社会现实、表达群众心声、唤醒国民家国意识和激发人民抗战决心，推动革命事业发展。当下，我国音乐文化建设也承袭了这一思想传统，坚持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要时代使命，积极发挥着提高民族凝聚力和民族文化自信，巩固国民爱国爱党信念，激励广大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奋斗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左翼音乐的生活性和社会性确立了当代音乐文化立足群众和现实表达群众呼声、反映社会现状的思想基调。左翼音乐重视对社会底层人民、妇女儿童生活情感的描绘和表达，尤其关注解放女性彰显女性抗争力量。我国当代音乐文化建设依然要秉持这一传统，在音乐文化建设中关注表达广大人民群众的情感思想，反映社会现实，避免出现无病呻吟、辞藻华而无实、缺乏精神思想内涵的音乐作品。

方法上开创我国音乐文化创作新思路

左翼音乐文化运动在对无产阶级音乐的积极探索中不断开拓新的歌曲创作方法，创新了歌曲创作体裁、形式和技法，为我国当代音乐创作提供了珍贵的经验，涌现出以聂耳、任光、吕骥、张曙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音乐家。聂耳和任光等革命音乐先驱坚持深入人民群众，结合中国传统民间音乐元素和戏曲文化进行音乐创作，使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间艺术特色，如《卖报歌》《金蛇狂舞》等；同时也适当结合了西方音乐风格特点，创作了《打回老家去》等作品。在歌曲体裁上，为便于传唱普及，聂耳开创了群众歌曲这一结构短小精悍的新型音乐体裁，歌曲音域适中、节奏简单，容易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并广泛流传。这些创作手法为当代音乐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我们能够从中得到启示：音乐创作必须面向广大人民群众、面向社会现实，同时当代音乐文化创新也需建立在继承传统民族民间优秀音乐文化元素和借鉴西方先进音乐文化元素的基础之上，推陈出新，面向未来。

左翼音乐运动并非是我国音乐发展史上的昙花一现，它所留下的理论根基、思想火光和方法经验还将继续指导当代音乐文化的创新发展。我国当下音乐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就是提升音乐作品的文化内涵、丰富其思想精神内涵、发挥好音乐建设的时代社会价值。这就需要我们传承左翼音乐运动的优良传统、汲取先进经验，发挥当代音乐文化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价值。

[作者系山西大同大学副教授，本文系2021年山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课题《左翼音乐运动与五四精神价值研究》（项目编号：GH-21046）阶段性成果]

评 点

炽热人生与时代洪流的双重谱写

——舞剧《冼星海》观后

□尹一伊

7月26日至28日，原创当代舞剧《冼星海》在国家大剧院进行了第二轮演出，作品通过情感充沛的舞蹈表演、突破传统的创新叙事与高度意象化的艺术表达致敬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彰显了中国青年的昂扬斗志与坚实信念。与不少同题材文艺作品有所不同，舞剧《冼星海》跳脱出传统英雄人物传记作品的叙事模式，聚焦音乐家冼星海的艺术创作历程与精神世界，几乎以角色的主观视角讲述冼星海辉煌又短暂的一生，以丰富的意象和情绪表达完成了冼星海作为艺术家的“小我”与作为革命者的“大我”的高度统一。同时，该剧在剧作结构、舞蹈编排、舞台美术等方面均有所突破，充满当代的审美旨趣，成功唤起观众跨时空的情感共鸣，以当代视角追寻革命时代的洪流，又将革命精神融入新时代的青年叙事，成功地表现了“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的信仰传承与使命感召。

从艺术的殉道者到人民的音乐家

不同于传统传记作品常常采用的线性叙事模式，该剧以冼星海一生中三个人格成长阶段为划分，分别展现了冼星海在外求学、钻研艺术的青年时期，受到革命感召、献身人民艺术创作的延安时期，以及身困他乡、思念故土的莫斯科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冼星海在这三个时期的人格转变，几乎不由关键事件或人物关系来牵引，而主要以冼星海个人“内观”的精神世界来完成，成功地引导观众专注于人物情绪而非情节，从情感出发，与冼星海的人生历程产生内在连接。特别是“星火”一角的设计，不仅作为冼星海人格的对照角色，也作为冼星海的精神信仰与人物命运的具象化，通过充满造型感的双人舞与镜像的动作设计，表现了冼星海在不同人生阶段面临的主要挣扎和觉醒历程。

在冼星海的青年时光，“星火”手握指挥棒，唤醒在巴黎表演时遭遇冷落的冼星海，引导他重新振作，终于创作出《风》等享誉巴黎的音乐作品。在这一时期，“星火”点亮了冼星海的艺术追求，让他蜕变为一位成熟的音乐家与创作者。在延安时期，学成归国的冼星海目睹中国人民在侵略战争中遭受的苦难，深感悲怆无力，“星火”为他拾回散落的乐谱，象征着冼星海求索救国之道，化悲愤为力量、谱音乐为兵戎，从追求艺术的殉道者成长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与自己的精神信仰“星火”以及光未然、袁牧之等爱国青年合舞，最终创作出《黄河大合唱》这一慷慨激昂的旷世之作。受困于莫斯科的时期，冼星海远离故土、心灰意冷，但仍继续创作，不断与命运抗争。在冼星海思念故乡故人时，“星火”手持孤灯，点亮流亡人心中的信仰之光；在他为病魔所困时，“星火”又化身为冷酷的命运，放下象征着冼星海生命倒数时刻的节拍器。可以说，“星火”的人物设置是高度符号化的，而其符号意涵的变化正是冼星海的人物弧光，是冼星海一生不屈抗争的写照，也是映射他坚定信仰的镜子。“星火”与冼星海一内一外、一冷一热的角色设置，成功地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展现在观众面前。

正是这样去标签化、专注于内心刻画的人物塑造，使得冼星海作为音乐家、文艺革命家和丈夫、友人的不同面向有机整合，将人民性与人性高度统一，避免了过度教条化、脸谱化的创作问题。在作品中，冼星海既有独立而明亮的人格，也有“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理想信念，呈现为生动的理想主义青年形象。他的一生就是时代洪流的回响，他的音乐就是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的重奏。家国情感对于青年个体的感召正是成长中从内而外自然发生的，而人民与信仰的相互选择也如同命运使然。正因如此，冼星海才能从艺术的殉道者成长为人民的音乐家，而他的抉择、信仰与执着在今日依然如此动人。

当代叙事中的“中国故事”

如何运用当代话语讲述中国故事，把革命精神传至当代青年，是众多弘扬主旋律的创作常常面临的现实问题。作为当代舞剧，《冼星海》摒弃了部分陈旧的表达方式，较为成功地应用了先锋的艺术和技术手段，以高度意象化的艺术风格完成了当代美学旨趣与传统革命精神的结合，再一次实践了以创新手段讲好“中国故事”的可行性，传递出“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的信仰力量。

在舞蹈上，作品在群舞层次、编舞等方面均加入了现代化的设计和编排，特别是第三幕中，冼星海进入生命倒计时的群舞，由舞者排列而成的时钟指针无情地推搡着冼星海向生命的尽头走去，而冼星海的恩师、妻女、好友、战友在舞台前景先后起舞，构成一段虚实结合、走马灯式的“蒙太奇”，视觉风格十分鲜明。同时，创作者在灯光美术上运用了大量高饱和度的纯色来表现冼星海在不同人生阶段的生命底色，从孤独清灵的湖蓝到斗志昂扬的鲜红，再到晦暗无光的沉灰，搭配以旭日、圆月等富有视觉冲击力的置景，充分发挥出颜色的符号指涉。除了颜色之外，在延安时期，尤其是表现《黄河大合唱》创作过程的重头戏中，一直以传达意象、烘托意境为主要功能的数字大屏第一次打破“第四堵墙”的作用，直接以文字形式对观众弹出了振聋发聩的抗日宣言。随后，在冼星海和革命战友一同投身创作、投身革命时，伴随着舞台上空落下的传单，大量抗日爱国文字从大屏上快速地划过，爱国之情溢于言表，正如黄河湍急的水流倾泻而下。曲成之时，激愤的文字之河化为黄河之水，而舞台上鲜红的长绸缎从天而降，配合着激昂的交响音乐与舞蹈表演，将昂扬斗志与战斗激情烘托到高潮。在这一段落中，该剧以多媒体技术和声光手段综合应用完成了对革命精神和中国故事的现代化书写，也将历史的语境转化为深入人心的情感共鸣，为观众带来心潮澎湃的观看体验。

“青年的命运，从来都同时代紧密相连”。舞剧《冼星海》正是通过对个人叙事与时代叙事的双重书写，完整地呈现出冼星海作为创作者的艺术热忱，以及作为革命者所坚守的坚定信仰，塑造出鲜活的人民艺术家形象，同时以当代的艺术、技术手段，完成了作品与观众、历史与当下跨时空的情感对话，也完成了对矢志不渝的理想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

雕塑《鉴真像》在日本东京揭幕永立

7月20日，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由中国美术馆馆长、雕塑家吴为山创作的雕塑《鉴真像》在日本东京落成，东京上野恩赐公园首次迎来中国艺术家的雕塑作品。

此次落成的《鉴真像》历时半年完成，连底座高2.48米，为青铜手工锻造。作品选取了鉴真大师当年渡海时挺立于船头乘风破浪的形象。塑像整体呈三角形稳定结构，造型沉稳庄重，表现出鉴真从容自若的弘法形象。作品融物质性与精神性、现实性与艺术性为一体，生动再现了鉴真大师的博大胸襟和大德风范。

1200多年前，中国盛唐时期的鉴真大师应日本僧人邀请，先后六次东渡日本，第六次东渡成功抵达时，鉴真已是一位65岁双目失明的老人。在日本，他主持修建了唐招提寺，还把盛唐先进的礼制、文化、科技带到了日本，为日本医学、建筑、艺术等方面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凸显了中国文化的厚德、开放与包容，一直深受日本人民的爱戴。

有“文化森林”美誉的上野恩赐公园是日本第一座公园。鉴真塑像在此永久耸立，“不仅使人们瞻仰他崇高的形象，感受他高尚的精神品格，也让人们回溯中日两国自汉唐以来就写下的美好的文化交流史。”吴为山说。（晓 璐）

中国摄协文化润疆项目走进特克斯

7月25日，由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摄影家走基层 助力乡村振兴——走进特克斯”文化润疆项目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克斯县启动。该项目旨在用摄影语言描绘美丽的特克斯，以摄影为媒介发掘当地深厚的文化底蕴，助力当地社会、文化和旅游的发展。

中国摄协副主席李学亮，中国摄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彭文玲，新疆摄协副主席、中国摄协教育委员会委员闫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郑律明等参加了启动仪式。中国摄协教育委员会秘书长、北京摄影函授学院院长张希红主持仪式。

启动仪式上，李学亮代表中国摄协向特克斯宣传部捐赠了第四届全国青年摄影大展入选作品《牧区医生》；特克斯教育局获赠“春风计划——中小学摄影教师培训班”教材；特克斯骑兵博物馆获赠新四军骑兵相关文物及影像资料；北京摄影函授学院理事田春亮代表有关方面向当地“马背上的博物馆”项目捐赠了20台VR，帮助每一位牧民都能看到博物馆中的精彩展陈。当日，北京摄影函授学院还与新疆师范大学签署了《“春风计划”助力文化润疆项目框架合作协议》，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签署了《助力考古实习基地建设 为“文化润疆”工程添彩框架合作协议》。活动现场，摄影家为特克斯各行各业先进人物拍摄的肖像照组成的“一枚勋章一生荣耀”主题摄影展亦同期展出。据悉，中国摄协还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摄影家走基层活动，发挥摄影特长，以影像之力助力乡村振兴。（晓 璐）

《人世间》授权文创品牌发布

7月9日，由北京一未文化、大道造物主办，上海三联书店READWAY、今日头条、头条眼界协办的“人世间杂货铺”品牌发布会在京举办。作为作家梁晓声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人世间》首款正式授权文创品牌，其设计推出意味着继作品同名电视剧、话剧之后，《人世间》IP内容生态的进一步探索打通。

据了解，该品牌设计理念秉承原著故事朴实厚重的传统风格，首先推出的“人世间故事书写笔”、四季福碗、心意杯等系列产品，“力图以人世间的情感为依托，以既能代表中国人的精气神，又跟随时代的创作，以文创致敬现实主义与百姓生活，让‘人世间’的故事和温情在器物上有所延续”。《人世间》IP全版权方、北京一未文化创始人吴凤未表示，期望通过“人世间杂货铺”文创新赛道，延伸原著作品的生命力和精神价值。未来，品牌还将根据四季变化继续推出新品，同时也会和其它优秀品牌联名推出受中国家庭喜爱的文创产品。（路斐斐）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编码：100125 总编室电话/传真：(010)65003319 新闻部电话/传真：(010)65002492 宣传发行部电话：(010)65935482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20170145号 零售每份1.50元 印刷：工人日报社印刷厂